



当代语言学丛书

DANG DAI YU YAN XUE CONG SHU

WAN QING SHOU BU GUO REN YI JIE DE
SHE HUI ZHU YI ZHU ZUO DE FAN YI SHI KAO CHA

晚清首部国人译介的 社会主义著作的翻译史考察

鲜 明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第54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 (2013M540992)

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W2013222)

东北财经大学优秀科研创新人才项目 (DUFE2015R09)



当代语言学丛书
DANG DAI YU YAN XUE GONG SHU

WAN QING SHOU BU GUO REN YI JIE DE
SHE HUI ZHU YI ZHU ZUO DE FAN YI SHI KAO CHA

晚清首部国人译介的 社会主义著作的翻译史考察

鲜 明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首部国人译介的社会主义著作的翻译史考察 /

鲜明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117-2914-9

I. ①晚… II. ①鲜… III. ①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

—著作—翻译—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D091.6

②H0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7898 号

晚清首部国人译介的社会主义著作的翻译史考察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 巍

责任编辑: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1(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17(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55626985(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35 千字

印 张: 8.25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66509618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意义	2
第二节 研究历史和现状略述	3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角度的研究	3
二、晚清翻译史角度的研究	6
三、词汇交流史角度的研究	8
第三节 翻译史研究方法综述	10
一、翻译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10
二、把内部史和外部史相结合的方法	14
第四节 研究内容简介	16
第二章 晚清时期中国翻译史简述	19
第一节 晚清以前佛经翻译对汉语的影响	19
第二节 西学翻译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20
第三节 晚清时期的翻译机构和翻译家	23
一、翻译机构	23
二、翻译家	25
第四节 晚清时期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	31
第三章 晚清学者对日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	34
第一节 近代日本对西方社会主义文献的翻译摄取	34
第二节 晚清中国人对日语的学习	37
一、晚清赴日留学生及中日两地开办的东文学堂	37
二、晚清中国人日语学习动机	38
第三节 晚清马克思主义学说译介的萌芽	41
第四节 晚清学者从日本译介的社会主义主要经典著作	44



第四章 《近世社会主义》的译介与接受	47
第一节 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步宣传	47
第二节 赵必振对《近世社会主义》的译介与接受	50
一、背景	50
二、译者	52
三、内容	53
第三节 译作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影响	57
一、翻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思想营养	58
二、翻译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借鉴	59
第五章 《近世社会主义》中术语的译介	6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及相关术语的译介	62
第二节 《近世社会主义》译介的术语个案考察	63
一、“价格”、“交换价格”、“使用价格”和“余剩价格”	64
二、社会主义	66
三、无政府主义	69
四、基督教的社会主义	72
第三节 术语译介的影响	73
第六章 《近世社会主义》的翻译策略与实例分析	76
第一节 翻译策略	76
一、直译	77
二、解释性翻译	80
三、补译	82
四、变译	83
第二节 译作的语言	84
一、翻译语言从文言向白话过渡	84
二、句法结构变得精密	86
第七章 结论与启示	89
第一节 结论	89
第二节 翻译的意义	90

第三节 翻译文化史的启示	91
参考文献	93
附录	101
附录 1 《近世社会主义》的部分文本内容	101
附录 2 《共产党宣言》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批判	117
附录 3 《近世社会主义》中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翻译文本	119
附录 4 《近世社会主义》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相关文本对照	120
后 记	123



第一章 绪 论

本章在陈述选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晚清翻译史和词汇交流史方面综述了相关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翻译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和把内部史和外部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章内容还包括具体的研究思路、研究的创新之处和章节内容结构安排。

一个国家的翻译事业是否昌盛往往与该国的经济、文化及对外交流息息相关。近代的有识之士把翻译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晚清时期是中国人大规模地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并引进先进的社会科学思想的重要时期。翻译为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中国近代翻译活动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别于其他任何历史时期翻译活动的重要标志。^① 20 世纪初期,大批中国青年赴日留学,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推向新的高潮。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学生深入到日本民间,通过求学、结社、集会、翻译出版书刊等各种方式,开展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学习日本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的日语学习热和留学日本热带来了日译西书的高潮。中国人通过大量翻译经典日译西书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西方新学。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译本正式面世的时间是 1903 年,是最早对《资本论》进行简要介绍的著作,是中国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部译作。该书是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专门化和体系化的介绍。

本书从经典文本翻译的视角对汉译本《近世社会主义》做原创性的个案分析,考察为何在晚清产生《近世社会主义》这部译著,它带来了哪些社会主义学说以及产生的影响。通过比较日译本与汉译本,考察晚清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术语和经典思想的译介过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此基础上,本书试图深入分析《近世社会主义》早期传播中翻译主体的翻译策略和成因,

^① 冯志杰:《中国近代翻译史(晚清卷)》,九州出版社 2011 年版,序言第 3 页。



探讨其内容选择和意义建构的历史语境，重新审视这一重要思想文献的翻译传播过程及翻译在其中的作用和意义。

第一节 研究的意义

《近世社会主义》的传播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名称上是不加区分的。晚清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等。所以这里的传播也包括社会主义。^① 本书试图提供一个晚清国人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著作从西欧到日本再到中国的路线图。1903年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最早接触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其翻译版本被多次出版。研究系统梳理该书的早期翻译情况，着重考察翻译选择及其原因，以及为什么选择翻译这些内容。《近世社会主义》的早期翻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翻译传播的开始及翻译模式的缩影，该译作也为探究翻译在思想文化传播中的意义和地位提供了典型案例。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汉译本《近世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弄清中国人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最初历程，对中国人的经典文献译介史是一个有益的补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一步一步中国化、大众化、群众化和民间化的，这将会为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社会主义在中国今天已经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人们在关注它的胜利发展的同时，自然希望回头来考察一下它在最初是怎样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中国人对它的最初反应又是什么，以便更好地了解事情发展的整个来龙去脉。”^②

① 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② [美] 伯纳尔：《一九〇七年以前的社会主义》，丘权政、符致兴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序言第1页。



在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人们开始将探索的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背景,即一百多年来的西学东渐史,并对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做了一些讨论。应该说,这些探讨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野,能够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①

通过研究经典著作译介史,我们可以察觉译者的政治意图、翻译主旨和学术风格,体会他们是如何追求马克思主义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译介者提供启示,我们需要继承和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从翻译学的视角考量,译者留下哪些宝贵的翻译经验,比如文本选择、翻译理念、所用术语、表述技巧等,其中的得与失、成功与不足,为我们当下乃至以后的翻译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通过研究译介的术语,我们可以弄清译名在现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受容和确立过程、新的译名与旧有名词之间的冲突、早期译者在译名的统一和规范化方面的努力。这部分研究旨在阐明译名在现代汉语体系中的受容与确立过程、早期学者在译名统一与规范化方面做出的努力。

通过思想史研究,我们可以考察历史是如何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的。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起来,将上述学科相关的有机内容结合起来并做深入细致的论证,最终力争实现能为上述学科提供一些有用的研究视角、思路 and 观点。

第二节 研究历史和现状略述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角度的研究

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研究较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进行考察的较少。国内此类研究主要是纲要式地、线性式地介绍中国人引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过程和读本。学界对《近世社会主义》译本的关注较多从早期翻译传播的史实进行概述,欠缺对早期翻译文本细节的研究。

在研究思路与旨趣方面,彭继红的专著《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

^① 汪信砚:《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华文摘》2012年第21期。



化的历程》探讨了 1899 年至 1921 年之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可能性、多种路径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早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较量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等。钟家栋、王世根主编的《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以新颖的构思和翔实的史料，对 20 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结合的历程，着重围绕“结合”，把史实和理性分析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做出了可贵探索。

在视角与方法方面，学界较多从传播史的视角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行研究，如唐宝林的专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00 年》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自清末进入中国近百年来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主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个曲折和两个辉煌的历史阶段。何萍和李维武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讨》结合世界历史的形成和中国近现代的思想运动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头、基本问题和文化环境。

冯志杰在《中国近代翻译史（晚清卷）》中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整个历史实践来看，经过了三条途径和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分别是间接译介和直接翻译原著。前者包括翻译介绍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和参考有关著作撰写相关著述，后者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作。在晚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处于萌芽状态，从方式上看主要是间接译介。从渠道上看主要是经过日本这一渠道。直接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是从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的。

译者是否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判别标志是：一是被翻译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二是译者翻译目的是否具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意识。

学界对晚清马克思主义译介的评价有褒有贬。

积极的评价有李百玲：

“从 19 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翻译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必要条件和初始环节，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马克思主义译入中国的特征和传播过程来看，翻译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特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奠定了基础。”^①

① 李百玲：《从翻译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上海翻译》2009 年第 1 期。



消极的评价有冯志杰，他在《中国近代翻译史（晚清卷）》中总结了晚清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特点如下：

一是翻译主体的多元性，包括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西方传教士等；二是翻译目的的复杂性，各类翻译主体怀着不同的目的译介马克思主义，因而不仅译介不全面，甚至有断章取义之嫌；三是翻译文本的零碎性，很多不是完整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往往是节译、摘译、转译，内容十分零碎，缺乏系统、完整的翻译文本；四是传播效果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本是面向劳苦大众的，但晚清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的受众依然是知识分子，因而传播效果十分有限，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变为广大劳动人民斗争的思想武器。

晚清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仅仅是处于萌芽阶段，呈一种“碎片”和朦胧状态，译介者既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翻译，更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有曲解。从译介传播效果来看，尽管起到启蒙作用，但未形成较大影响。

欧阳跃峰也认为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理论的输入是直观的、粗浅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从形式上说，是摄像式的、限于表层的；从内容上说，是未加诠释的、真伪混杂的。

20 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翻译日本人撰写的有关社会主义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猎奇的心态。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和理解这些书中介绍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甚至没有来得及将社会主义学说与其他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进行简单的比较，没有来得及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初步的鉴别。他们并不确切地知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具体何在，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也从未想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与将要发生的中国革命之间具有什么关系。他们的目的只是力求准确地按照日文原意把这些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翻译成中文，使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中国人在读了这些书之后，能够知道世界上还有社会主义这么一篇大道理。至于日本学者介绍的是不是正宗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否有失误和偏差，他们既没有能力进行辨别，也无从加以评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弄清西方国家到底出现过哪些社会主义流派，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之间具有什么样的渊源关系，以及它



们的本质区别是什么。甚至限于他们的日文水平以及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能力，翻译中的错误也屡见不鲜。^①

二、晚清翻译史角度的研究

中国近现代的翻译活动始终与社会各个方面紧密相连，但译史研究者多把目光放在文学等学术领域，有很大的局限。事实上，其他领域有着丰富的翻译事件，有待我们去发现。不仅可以使更多的重要翻译现象浮出水面，从而得出新结论，也能以此使译史研究走向立体，还原译史应有的完整面貌。^②

潘喜颜在其博士论文中总结了清末历史译著的情况，指出：

清末史传译著具有与古代史传不同的特点。清末留日学生取代传教士成为翻译的主力，他们共翻译了至少 234 种历史著作，占全部历史译著的 51%，因此可以称为“留日学生主译时期”。清末历史译著的主要出版机构为民办出版社，其中出版数量最多的是上海广智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其中绝大部分历史译著是在 1901—1904 年之间出版的，其中又以 1902—1903 年为主，而 1903 年是史书译介的鼎盛时期。从 1904 年开始，历史译著逐渐减少。

1900 年以前与 20 世纪初的历史译著在译本来源、译者、译书目的和出版等方面大为不同：前者大部分取自西文，后者大部分取自日语；前者译书的主体是教会和朝廷，后者是士大夫、学生；前者译书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西方文明，后者译书的目的是为输入文化挽救危亡；前者的出版机构为教会机构、官书局，后者出版机构为民营机构。

董说平在其博士论文《晚清时期日文史书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中归纳了日译西书大量在晚清时期译介到中国的原因。

晚清时期日译西书的汉译是近代中日文献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原因在于：第一，资产阶级进行启蒙宣传的需要；第二，日本学说中包括比较全面的西方思想；第三，新学堂需要大量新式教科书；第四，大批留日学生的出现。

① 欧阳跃峰：《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

② 王建开：《翻译史研究的史料拓展：意义与方法》，《上海翻译》2007 年第 2 期。



涂兵兰在论文《清末翻译语言的伦理抉择》中对晚清翻译的伦理以及译者与读者的关系做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梳理和研究。研究认为：清末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期，也是重要的翻译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带有很强的目的性，译者为实现政治价值、经济价值、道德价值以及对社会个体的价值进行翻译。

综观整个清末译坛，清末译者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并确立翻译活动的目的：政治价值——西学翻译有助于改良群治，挽救危机中的国家；经济价值——西学翻译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并给自身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道德价值——西学翻译有助于发扬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价值或者重新确立一种新的道德体系；对社会个体的价值——西学使社会个体获得新知识、满足健康的感官享受和精神享受。这些目的和价值并不一定同时存在于每一次翻译活动中，甚至有时会有很大的冲突。

涂兵兰在《清末译者与读者关系考察》中还指出：在清末，读者和译者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前时期的特点。

在清末社会伦理关系、政治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语境下，其译读关系呈现复杂性和过渡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师生关系、商客关系以及朋友关系。

在任何一种关系中，译者都应该注意读者是译本生存的关键因素。清末译者进行翻译大体上出于两种目的：出于营利的需要以及出于救国的需要。在清末初期，翻译的大量盛行与清末的政局是密切相关的，它的发展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治局势的附属品。它是进行政治改革的工具，是达到改良目的的手段。清末接连几次战败更强化了译者的这种意识，因而在这段时期以“救国”为目的的翻译占主导地位，而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翻译直到民国初年才越来越强势。^①

此外，晚清翻译的赞助问题也是研究晚清翻译史的一个视角。

赞助者对晚清翻译的影响包括：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影响翻译作品的出版和读者的接受。晚清时期官方赞助和民间赞助共存，在我国的翻译史上比较少见。然而正是这种多元赞助构成，造成了晚清翻译的繁荣和具有开拓意义的翻译成绩。^②

① 涂兵兰：《清末译者与读者关系考察》，《外语学刊》2013年第2期。

② 王湛：《晚清翻译的赞助问题》，《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赞助通常包括三个基本要素：意识形态要素、经济要素和地位要素，它们通常以不同的形式组合并相互作用。意识形态要素对文本形式及内容的选择和发展进行约束。这里的意识形态不涉及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而是指规定我们行为的方式、习俗以及信仰。经济要素是指赞助人予以作者或改写者一定的津贴或职位，使他们得以生存。同时赞助人也会对作品的销售付版税，或者请专业人士当老师或评论员。最后还有地位要素。作品只有为赞助人所接受，才有可能融合到某个支持的读者群及其生活方式中，才能被读者认可和接受。^①

王湛还在该论文中概括了晚清翻译的三种模式：第一，由清朝高官重臣设立机构，赞助翻译活动。第二，由传教士直接创办、主持的机构来组织翻译活动。第三，各种译书机构。比如梁启超联合维新派人士集资在上海成立大同译书局，主要翻译各国“变法”及有关各类办事章程、商务之类的书籍，作为变法的参考。另外，还有1897年2月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发起人是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和高凤池等人。1900年，商务印书馆盘下了日本人在上海经营的修文印书馆，于是规模得以扩大，称为中国近代出版业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出版机构。另外，还有会文书社和广智书局等。这种模式下的赞助人与译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基本具备现代形态下的商业关系，主要表现在有纯商业性质的买卖关系。但是这一时期的商业关系还没有完全实现，其中夹杂着师生朋友以及志趣相投者之间的友情合作。

三、词汇交流史角度的研究

近代马克思主义术语多从日语翻译而来，大多直接借用和制汉语的书写形式。作为时代语言的记录者，它们在内容上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时最初的汉语形态。

李博在《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一书中总结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产生的条件并举例说明了汉语中个别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历史和作用。朱京伟在《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早期日译及其译词》一文中弄清日本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对中方术语的影响关系，从词汇史的角度对这些术语在日本生成的历史过

^① 王湛：《晚清翻译的赞助问题》，《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程和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

日本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德国学者李博的研究结果表明：汉语借用自日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有 56 个，从日语中暂时借用，后来又被其他新词所代替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有 9 个，中国未受日本影响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有 1 个。^①

李博在其专著中总结了汉语中个别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历史和作用，1903 年前已经在日语文献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术语，包括第一，汉语借用自日语的术语，如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封建主义、阶级、阶级斗争、生产、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率、劳动、劳动力、政治经济学、私有财产、农民、地主、人民、权力、政权、解放、反动、思想、理论、唯物论、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第二，从日语中暂时借用，而后又被其他新词所代替的专门术语，例如：劳动者原意为工人，后来意为劳动的人。劳动阶级被工人阶级替代。垄断代替独占。统治代替支配。压迫代替压抑、压制。1903 年以来，在日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里以标准形式出现的专门术语如下：第一，汉语从日语中借用的专门术语：矛盾、对立、对抗、不断革命、辩证法、价值、修正主义、改造、意识、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无产者、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践。第二，从日语里暂时借用，后来又为其他词所代替的术语。例如：资产者、资产阶级代替有产者、有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替小有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代替中产阶级，专政代替独裁，剥削代替榨取，觉悟的、觉悟性代替自觉，群众代替民众与大众。

根据朱京伟的考察，到《资本论》三个译本问世时，马克思主义术语已经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在构词上表现为，出现新的二字词或三字词的机会大大减少，四字词和多字词语继续扩展。大多数二字词和三字词并非表述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专用术语，而是用途宽泛的一般性词语。四字词和多字词语绝大多数是经济学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用术语。从词语的结构来看，四字词和多字词一般都是在二字词的基础上进行一次或多次组合而形成的。二字词表达一个基本的上位概念，四字词和多字词语则把上位概念细分

^① [德] 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赵倩、王草、葛平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4—413 页。



成若干个下位概念。

这个词群是开放性的，还可以按照需要方便地增加其他成员。其他如“资本”、“生产”、“劳働”、“価格”等基本概念的词，也都形成了或大或小的词群。然而，由于四字词和多字词是由二字词逐级构成的，各个构词要素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致使它们的结构稳定性较弱。因此，四字词和多字词的新术语数量虽多，但其中有许多很快就被其他词语取代而消亡了。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以二字词为基础的逐级构词方法，是明治时期以后日语在构建学术用语体系时常用的重要方法。反观清末时期的来华传教士或中国文人当时翻译的科学书籍，在拟定译词或术语时很少使用这种逐级构词的方法，在构词上缺乏明确的体系性。应该说，这是来华传教士和中国文人创造的术语最终不敌日语借词的一个重要原因。

吴棻弘在《法律翻译与法律移植——以晚清法律翻译实践为例》一文中对晚清日译法律术语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晚清的法律术语多将日语中的汉字直接植入中文译文。完全音译的翻译方式最大的弊端在于读音晦涩拗口，在接受程度上会大打折扣。照搬日语中汉字的翻译模式存在的问题：尽管运用的汉字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中国，但因经历从西语到日语的翻译过程，这些新词汇的意思恐怕已经很难从中文汉字本身的含义来解释。

这期间一些译名曾经传入中文世界，但最终被抵制使用。屈文生在专著《从词典出发——法律术语译名的统一与规范化的翻译史研究》中认为可能是因为它们与中国既有的名词发生了冲突；另一些与留英派的译名发生了冲突，输给了英美等国家留学生的创造性翻译。一些译名经过修正后正式进入中文世界。作为时代语言的记录者，它们在内容上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社会主义传入中国时候的最初汉语形态，获得合法性的证据或者证明。

第三节 翻译史研究方法综述

一、翻译文化史的研究方法

翻译文化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翻译史的主题涵盖了翻译文学、译学理论、科学文献、翻译文化和语言学等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



继续挖掘的必要,从而进一步丰富中国翻译史的建设。

译史的研究相对来说是一种文化研究。因为翻译是文化发展、文化交往的产物,也是促使文化繁荣和变异的要素。翻译使文化具有了杂交的优势,所形成的翻译文化是本土文化同外域文化互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史研究是翻译文化史的研究,对文化和翻译两方面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从方法论上说,译史的研究不同于译学里的应用的和基础的研究,前者关心翻译的结果,翻译的文化意义,后者注重翻译的过程,翻译的语言转换。^①

翻译文化研究包括翻译史、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它也可以称为翻译文化史研究,因为通常是以既往的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作用为研究对象,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距离。综观中外的翻译史,翻译都曾经对译入语国家的语言产生过影响。

例如中世纪阿拉伯人翻译了大批古希腊典籍,不仅推动了阿拉伯学术研究,而且保存了古希腊文化精萃,使后来的欧洲学者得以从阿拉伯文中将这些希腊典籍译成拉丁文,反过来促进了欧洲的学术研究。又如中国汉晋以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不仅传来了一种宗教思想,更从哲学思想、文学思潮、创作题材以及语言文体等方面给中国文化以深远的影响。正是从翻译文化史上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翻译的意义,认识翻译虽然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但又决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它代表了社会的交往、文化的沟通与互惠互促。^②从翻译看文化的沟通和发展,将翻译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在国内,王克非的论文《从中村正直和严复的翻译看日中两国对西方思想的摄取》首次尝试将翻译史同思想文化史结合起来研究,通过分析个案,探讨中日两国近代如何选择西方著作和如何以翻译为途径走向现代化。

文化既是人类创造的价值,又具有民族、地域、时代的特性,因此不同文化需要沟通。这种沟通离不开翻译,因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可见,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活动离不开文化。翻译文化史主要就是从历史发展上研究这二者的关系。它研究的是,经过了翻译这样的沟通工作之后文化发生的变化。它也

① 王克非:《论翻译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

② 王克非:《论翻译研究之分类》,《中国翻译》1997年第1期。